

洋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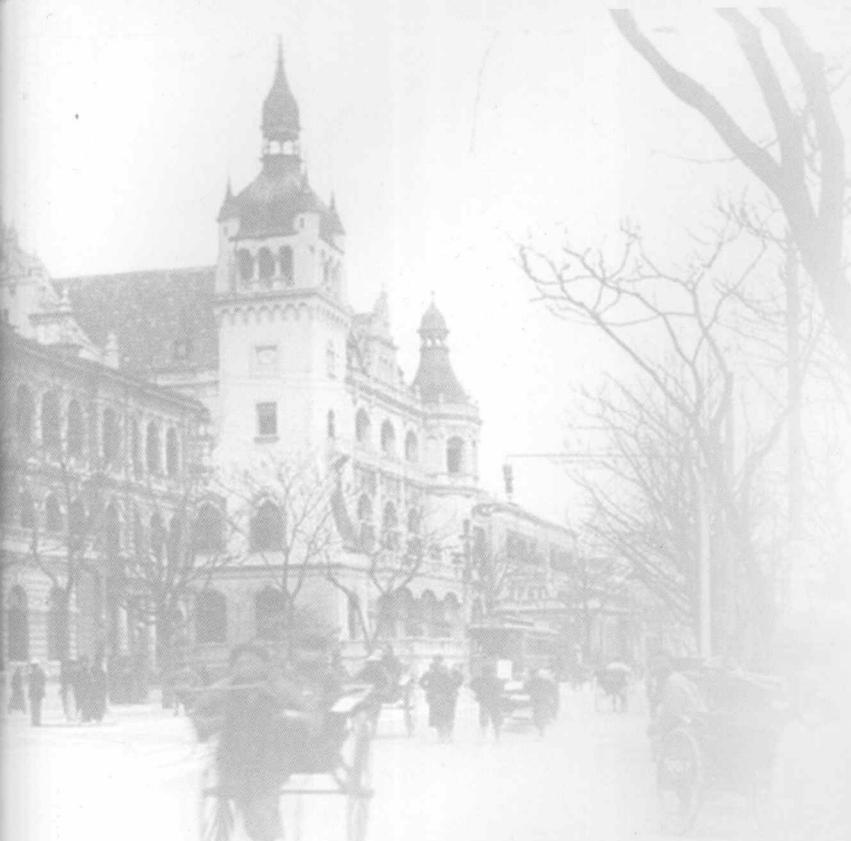
上海 1843~ 1956

YANGSHANGSHI
SHANGHAI 1843~1956

王垂芳·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 1843~
1956

YANGSHANGSHI
SHANGHAI 1843~1956

王垂芳·主编

洋
商
史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洋商史——上海：1843～1956／王垂芳主编.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6

ISBN 978-7-80745-050-4

I. 洋… II. 王… III. 商业史-研究-上海市-
1843～1956 IV. F7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7436 号

洋商史——上海：1843～1956

主 编：王垂芳

出 品 人：朱金元

责任编辑：施恬逸

装帧设计：闵 敏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31.5

插 页：4

字 数：800 千字

版 次：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45-050-4/K · 011

定价：98.00 元

《上海洋商史》编写人员名单

主 编：王垂芳

编写及资料收集（按姓氏笔画）：

王垂芳 王西秩 史孝瑛
吴 钟 吴琦炎 张耀华
陆平权 范洪涛 黄清根

弁 言

外国商人，晚清时称之为洋商。洋商在上海的贸易活动，远可追溯至唐天宝十年（公元 751 年），即使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上海开埠算起，他们在上海的贸易活动也长达 160 余年，其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但由于解放后几十年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没有提到应有的地位，导致对洋商研究很冷落，不但研究者寥寥，研究成果也不多。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国家对外开放的不断发展和加入世贸组织，对外经济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之在经济、金融、贸易领域，与外商来往频繁，开始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并把对洋商的研究提升为重要课题。

“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系统、深入地研究上海开埠以来的涉外经济史，可以为推进上海对外开放，进一步发展上海的外向型经济，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为此我们从 2002 年开始编写本书，历时六年，于 2007 年定稿付梓。全书约 100 万字，分 9 篇 37 章 141 节（另附录 3 篇），插图 150 幅，附表 142 份，较完整地勾画了上海洋商百年的发展轨迹。

《洋商史》系在我主持编写的《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志》过程中，积累 3 000 余万字的资料，2 100 幅历史图照的基础上，又从外贸系统搜集了大量的中外文洋商史料，本书的编撰工作可谓集众人之智慧。《洋商史》所描述的从上海洋商企业的起源到上海解放后洋商企业的逐渐消失；从上海洋商开设进出口贸易洋行起始，发展到创办涵盖各行各业的工业、商业、航运业、公共事业、文化事业；其时间跨度之长，洋商企业行业之齐全，内容之系统、全面，资料之翔实，图片之稀有，可以说是弥足珍贵。上海是近代中国的窗口，在与洋商的交往中，是中国的缩影，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洋商史。它的问世，我想对中国对外贸易史、中国近代史，以及外交史的研究，都是有所裨益的。

《洋商史》的撰稿，第一篇由黄清根、张耀华执笔，第二、三篇由吴琦炎执笔，第四、五、七、八篇由王西秩执笔，第六篇由范洪涛执笔，第九篇及综述、附录由吴钟执笔，部分篇章由吴钟协助修改，插图由陆平权、史孝瑛遴选，全书由王垂芳制订框架、统稿、定稿。其中“金融篇”得到洪葭管先生的指点和帮助，在此表示谢意。由于《洋商史》篇幅浩瀚，笔者水平有限，定有不足之处，恳请海内

外读者不吝指正。

《洋商史》是我业已过了“从心所欲”之年后的一部集体著作。我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涉足文章，1984 年转向写书，二十余年始终没有停止笔耕。然而知也无涯，学也无穷，不仅难以做到从心所欲，而且每跨一步仍异常艰辛。回顾这些年的写作生涯，感慨不少，可以用“甜酸苦辣”四个字来概括，也就是说什么滋味都尝遍了。这恐怕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所共有的一种体会吧！我喜欢郑板桥赞赏竹子的几句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并常常用它来激励自己。这既是一种自我的鼓励，也是一种无形的反击。在鼓励中我得到无穷力量，在反击中我更为坚强。我的一本又一本著作，就是在这样一种心态驱使下问世的。今后只要身体允许，我仍会继续写作下去，“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在垂暮之年，殚精竭虑，勉尽绵薄，为后人留下点雪泥鸿爪。

至于如今问世的这部《洋商史》对社会贡献如何，就期待读者去评说了。

王垂芳

2007 年 5 月 9 日于上海

人国英。宜宣威更声主外宜出，振豚畏容，人西者善能人销土，该身固凝汗义，封贡献采会士的麻
匪渠升四十长谷百脉八十办川道士主赠人腊烟”；“告姚宣效其向(George Smith)俱密谋，当裁
出再批以云禁出，口出主国避宣籍土从”；“告(Я. Яков, Я.)因国避事般因英”。气土助其林茶丝
版言善美，英幽州飞齐制垦下。意融代更吾坐，封林消更新上”。类互见於1832年革何处至，口
顺一概相得之于土，来查至德人商园农进大，商土那块地直裁只理商国答，许我置归销土降惠
全古臣代土而土。革1832年中，革1832年占领国全空，即察口出销土，革1832年。遂
知是销土五五革。革1832年中，革1832年占领国全空，即察口出销土，革1832年。遂
界斯量，界居英氏之禁司边，如孙缺留旨义主另置英领亩1832年开商总央一西归正斯黄，非以
责：城。对游逐节首皇商羊，申南略杀景于销土。界斯的大量土地居式疑数司日，界斯个一策土
解化；革1832年对映兼事融交，将关宝树已参；革1832年，故内商游人案，革1832年立交，墨街此班，墨突良
施缺。共1832年原草卖衣销土出因。然缺孙商羊代长百氏子，对明首利次而关商丁所领又同头
始。上海地处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点，长江入海口，背托富庶的长江流域，具有特别优越的地理条件。清道光年间，上海港已呈现民间贸易、官方贸易、合法贸易、走私贸易并存的格局。

1832年(清道光十二年)，英人林德赛偕郭士立等乘英船阿美士德号闯入长江口，潜入黄浦江，沿江活动19天，侦察了上海的港口和商业。林赛回国后的报告中，几次提到上海，认为“这个地区的自由贸易对于外国人，尤其对英国人的好处是不可估计的”，并且特别强调“这一地区在对外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特殊优越性”，对“过去竟然未曾引起相当注意，是十分令人奇怪的”。差不多同时，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也曾到过上海，回去后说上海是“中国东部海岸最大的商业中心，……上海的贸易即使不超过广州，至少也和广州相等”。稍后，另一英国人福钧也曾说，“就我所熟悉的地方而论，没有别的市镇具有像上海所有的那样有利条件。上海是中华帝国的大门，广大的土产贸易市场。……内地交通运输便利，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比得上它”。林赛还以私人信件形式向英国外交大臣献策，怂恿英国政府使用武力打开中国门户，取得在上海的贸易权。在鸦片战争中，侵华英军就是参照林所供情报，选择进攻和登陆地点。英商怡和洋行创办人之一詹姆士·孖地臣出任主席，于1834年12月致书英国女王请愿：一要结束广州中国行商的垄断，二要开放中国北部各省口岸，请求英政府派军舰封锁中国沿海，除广州、厦门、天津之外，还要在上海港口驻泊英国小型舰队，强迫清廷接受通商要求。1840年3月18日，怡和洋行在伦敦的“机密代理人”莫克·维卡给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写了一封“私人函件”，信中特别强调要在地位临近中国最为富庶繁华的省区，占有一处居留地的作用，“依我看来，超乎一切的一桩紧要的事情是占有一处居留地。在那里，我们可以生活在不列颠法律的保护之下，免得遭受那些半开化的汉人子孙的侵害”。巴麦尊在训令中对要建立这种居留地的口岸，作了具体明示，其中提到扬子江口的上海县是值得考虑的。而上海开埠前夕，据统计贸易总量为5330万两，其中上海埠际贸易货值4840万两，占90.8%；正常外贸货值450万两，占8.44%；鸦片走私贸易货值40万两，占0.75%。当时上海港的外贸总体规模虽不大，但已是全国重要贸易港口之一。当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清帝国大门的时候，上海很自然地被列为通商五口之一，并逐渐成为洋商在华贸易居留的首选地。

1843年11月，上海被迫辟为商埠。洋商进一步发现，上海不仅有良好的经商环境，而且政治

和社会环境宽松,文化氛围良好,上海人能善待西人,容易相处,比在广州生活更加适宜。英国人乔治·斯密斯(George Smith)向其政府报告说:“欧洲人能在上海以低于广州百分之十的代价买到丝茶和其他土产。”英国领事阿礼国(Alcock, R.)估价:“从上海直接运生丝出口,比转运广州再出口,至少可节省35%~40%的运费。”上海更能赚钱,生活更为顺意。于是原在广州的英、美洋行迅速到上海设置分行,各国商船开始直接驶抵上海,大批外国商人纷至沓来,上海开始与欧洲、美洲直接发生商务联系。五口通商后,其他四个口岸对外贸易升而复降,贸易重心逐步由广州移到上海。1844年,上海出口茶叶,在全国所占比重仅为2%,广州占98%。至1850年,上海上升到占全国的44%,广州下降至23%。1846年上海出口生丝已相当于广州的4.27倍。1845年在上海县城以北、黄浦江以西一块总面积达830亩的英殖民主义者居留地形成,以后称之为英租界,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租界,日后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租界。上海由于是条约商埠,洋商享有许多特权。如:赁房买屋,租地建屋,设立栈房;深入沿海内地,通商航行;参与协定关税,受领事裁判权庇护等;外籍税务司又控制了江海关的实际管理权,千方百计为洋商降低赋税。因此上海外贸急剧上升。据统计,上海开埠10年后,1853年(清咸丰三年),对英国进出口货值已达1720万美元,超过广州的1050万美元。此后上海的进出口货值即在全国领先。随着长江沿岸与上海之间贸易渠道之畅通,1864~1873年的10年间,上海累计进出口总值8.14亿关两,占全国59.8%。此后1884~1893年,上海累计进出口总值达10.10亿关两,比上10年又增加24%,占全国49.4%。1894年甲午战争前的近半个世纪,商品贸易是上海对外经济关系的主流。这一时期上海已确立起全国对外贸易中心地位。

一是进出口贸易业。1843年,第一批在上海开设的怡和、宝顺、仁记等5家洋行,都是英商从广州分设过来。1844年上海有洋行11家,1847年增至24家。1852年为41家,其中英商27家,占2/3,美商5家。1859年有62家,其中以英国资本为最多。1876~1884年洋行数由160家增至245家。1892年增至579家。19世纪后期,英商洋行占上海洋行总数的60%,高居首位,美商洋行仅次于英商洋行。德商洋行发展较快,1872年40家,1894年达85家。法商洋行19世纪90年代也有30余家。1871年中日通商条约签订后开设起来的日商洋行,90年代也增加到30家左右。

早期的洋行,在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同时,也逐渐兼营航运、保险和金融。60年代后,航运、银行、保险等专业独立发展。洋行的贸易方式,以以货易货为主,兼营抛期货、卖路货(途中之货)、订货、拍卖等等。中小洋行由代理行逐步转为佣金商,订货为主要经营方式,洋行和客商签订合同代理购销商品、设备、收取佣金。实力雄厚的洋行一方面竭力增加进出口贸易量;另一方面扩大经营范围,投资于航运、银行、保险等与贸易相关行业。

1843~1894年,有11个国家的洋商在上海的直接投资额为289万美元,英、日、美分别居前三位。英商138万美元,占47.75%,居首位;日商46万美元,占15.92%,列第二位;美商45万美元,占15.57%,列第三位。洋商向其他行业的直接投资,一是直接为贸易服务的船舶修造业和航运业。这是早期洋商投资的主要领域。1850~1859年,洋商在华开修造船的企业18家,其中设在上海的为12家,至1894年,增至27家。经兼并改组继续经营的为8家,资本总额为323.8万元,占外资工业总投资的1/3,成为上海外资工业投资最大的行业。1863~1865年法兰西火轮公司和英国海洋轮船公司相继开业,与英国大英轮船公司构成上海与欧洲远洋运输业“三巨头”鼎立局面。1867年,美商太平洋邮轮公司成立,率先开辟上海—旧金山之间航线,成为上海在太平洋上与西方国家沟通贸易的第一条航线。直到19世纪末,英国航运势力始终在以上海为枢纽的长江及南北洋航线上占据着绝对优势,而且日益深入内陆腹地,使上海逐步跨入国际航运潮流并形成

全国交通枢纽地位。与此同时,为航运业服务的打包业、仓储业、码头等也相继发展。

二是开始有金融保险业。1847年英商丽如银行率先在上海建立代理机构,1849年正式成立分行。金融从洋行兼营业务中分离出来,是为上海近代金融业之滥觞。嗣后有7家英商银行和1家法商银行开业。1875年英商汇丰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很快使一些钱庄为其附庸,进而操纵上海金融市场。同时意味着以英国为主的西方金融势力强化了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控制,为国际资本的大规模输入奠定基础。1848年起,洋商保险公司也开始介入并逐渐控制了上海的保险市场。

三是为洋商和租界居民服务的公用事业和服务业,如自来火行(煤气厂)、自来水公司和礼查饭店、仁济医馆、跑马总会等不断涌现,洋商投资和居留环境逐年得到改善。随着地价上升,洋商还热衷于投资房地产业。

四是直接掠夺中国廉价人力、物力资源的工厂企业。这一时期还为数不多,主要是缫丝业,还有印刷、饮食、制药、卷烟、肥皂、火柴、榨油、锯木和家具等新行业。这些工厂企业规模不大,却是上海大工业的先声。

五是伴随着租界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需求,加之19世纪60年代以后交通通讯业的发展和印刷技术的革新,文化市场在租界逐步呈现。洋商或教会创办的英文、中文、德文、法文、日文报刊,洋商或洋商捐助设立的中小学堂和大学堂,洋商兴办的商业性文化娱乐设施和各项商业化运作的体育俱乐部(协会)先后在上海出现。

这一期间,上海洋商发展的史实告诉我们什么呢?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上海的土地上首先出现了“国中之国”——租界,这是上海人乃至全中国人奇耻大辱的历史。但是,历史的另一面也告诉我们: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条件和可能”^①。洋商在掠夺中国资源的同时,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与生产方式,它冲破了中国封建落后的生产关系,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洋商输入西方先进的技术与观念,带来了全新的生产力,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华商经营理念变化和经营手段的改进,提高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殖民主义者凭借特权建立的租界,有一整套西方治理城市的规章制度和民主色彩的机构,形成一块保护资本主义经济安全发展的地区,在这里不受清廷官僚的控制,有适应经济、发展逐步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和文化设施,促进了上海近代城市建设。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先导作用下,洋商企业资本构成形式出现股份制,不久,华商也办起股份制的轮船公司和机器织布局;上海每出现一种洋商新工业,不用多久,就会有这一工业的华商企业诞生;洋商企业新引进的机器设备,随后不久华商企业也会采用同样的先进设备。由于上海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也由于上海有上述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楔入客观上产生的先导作用,还由于上海对于开放世界的接纳和认同,因而各国洋商相继来沪,内地移民大量涌入,到清光绪初年(1875年),上海有人口67.4万,在中国仅次于北京、广州,在世界上也排名第十一位,进入大城市行列。西洋近代物质文明通过火轮船、煤气灯、自来水、电报等生动具体地摆在人们面前,为上海人了解世界开了一扇窗户。中国第一个引进近代机器的洋务企业——江南制造局设在上海,最早有煤气、电灯、自来水的城市也是上海。与天津相比,城市煤气早19年,电灯早6年,自来水早14年。近代文明的优势是明显的,它激励上海人去效法、学习,融成了兼收并蓄的文化特色,使上海成为中国得世界风气之先的城市。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

三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失败,《马关条约》订立后,列强取得来华设厂权,加上随之签订的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内河航运从长江扩大到“从上海驶进吴淞江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的其他内河,洋商到内地收购土产享有的子口半税优惠扩展到使用买办为其服务等,使洋商投资得到全面保障。与此同时,外国对华侵略进入了以资本输出为主要特征的新时期,对中国大量输出资本,于是洋商对上海投资猛增。仅五六年间,英、美、德等国商人在上海开办了41家资本在10万银元以上的工厂,约占同期在全国所建工厂的45%以上。至1911年,洋商在上海开办企业643家,主要为美、英、日等国投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国家忙于战争,日本、美国商人乘机加大投资。1931年洋商在上海投资总额达11.12亿美元,占在华投资总额的34%。1936年,上海洋商工业资本增至4亿元(法币),是甲午战争结束时975.2万银元的40倍。

洋商投资分布在轻纺、金融保险、房地产、航运、公用事业、进出口加工、文化等各个领域。

轻纺和日用品业。1895~1904年,英、美、德商在上海开办怡和、老公茂、鸿源、瑞记四大纱厂,除英商的老公茂纱厂资本为80万两外,其余3家资本均在100万两以上。稍后,日商也开始在上海棉纺织工业投资。1902年英日合办设立上海纺织有限公司,1911年日资内外棉株式会社开始在上海设分厂,至1924年共设分厂11家。一次大战期间,日商纷纷在上海设立新厂,新设资本在10万银元以上的工厂有5家。至1930年,上海共有日商纺织厂33家,纱锭110.94万枚,占全国中外纱厂纱锭数的27%,远远超过上海华商、英商纱锭数的总和。洋商投资烟草、火柴、制皂、饮料食品等业,形成了一批垄断性的大型企业。较著名的有英美烟公司、日商东亚烟草株式会社、燧昌自来火局、英资中国肥皂有限公司、白礼氏洋烛厂、美商沙利文糖果厂、英商正广和汽水厂、美资中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等。1936年,洋商工业仅棉纺品、卷烟、机器与船舶修造、电力4行业,产值即达3.47亿元(法币),占当年上海工业总产值的29%。上海已成为近代中国轻纺工业的主要基地。

金融保险业。随着西方列强对华经济从商品输出转而为以资本输出为主,至20世纪20年代,上海共有11家洋商银行,分属8个国家。世界上著名的大银行如德华、横滨正金、华俄道胜、东方汇理、花旗、华比、荷兰、住友、三菱、三井等均在上海设立分行,外滩成为著名的金融街,上海成为金融中心已初具规模。1931年前后,上海金融市场兴旺,黄金成交量仅次于伦敦与纽约,超过巴黎、东京和孟买,外汇市场活跃远远超过日本。20世纪30年代,外资银行加上各种官办、民营的中资银行、钱庄,上海约有300多家金融机构。保险业以英资居多,抗日战争爆发前,上海有洋商保险公司34家。经营火险、运输险(货物险)、船壳险以及意外险等业务。

房地产业。抗日战争爆发前,上海有洋商房地产公司75家,地产估值合法币16亿元。新沙逊洋行1877年开始投资房地产业,至1935年直接经营或投资渗入的各类公司达30多家,占有地产50余处,形成庞大的垄断集团,经营规模和实力居上海房地产业之首,被称为“上海的房地产大王”。哈同在1931年拥有土地449亩,市房812幢,住房544幢,办公大楼24幢,旅馆饭店4幢,仓库3座,包括动产价值在400万英镑左右,是上海的巨富。

航运业。甲午战后,上海港和上海航运业,仍为英商所垄断。进入20世纪后,逐渐形成英日分霸格局。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等外资轮船公司控制着远洋航线和北洋、南洋航线。尽管有华资招商局、三北、宁绍等公司与之竞争,但客货量1/2以上仍被英、日轮船公司占有。与航运业相伴而生的上海码头仓储业,容量最大、设施最好、位置最佳的码头几乎全是洋商码头。至抗日战

争前夕,洋商码头的附设仓库面积占上海港仓库总面积的 79.2%。

公用事业。从 1864 年英商集资创设上海煤气公司开始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洋商在上海共建立了 9 家公用事业企业。这 9 家企业的资产占上海全部洋商资产总额的 45%。上海外资电力公司的发电能力占全市总发电能力的 91%,其中投资额最大的美商上海电力公司的发电能力达 19.85 万千瓦,占全市发电能力总和的 81%。洋商自来水厂供给全市 71% 的自来水,洋商煤气公司供给全市 76% 的煤气。1901 年汽车首次输入上海。洋商出租汽车行至 1921 年增至 24 家,以美商云飞公司规模最大。1907 年英商上海电车公司和上海法商电车公司先后成立。1922 年英商在公共租界首创公共汽车公司。至 1926 年洋商共开通 11 条电车线路,总计 80 余辆电车。上海国际电信业务,长期被大北、大东、太平洋等洋商电报公司把持,市内电话则为美商上海电话公司所控制。

进出口加工业。出口加工主要有打包、皮革、禽蛋加工等。至 1936 年上海有 5 家洋商制革厂,资本总额达 145 万元,产值约占全市皮革业总产值的 45%。进口加工业主要是煤油(火油)贮存、再包装、销售等一系列业务。最著名的是英商亚细亚火油有限公司和美商美孚公司、德士古有限公司。三大公司采取遍布销售网、廉价倾销、随送赠品等办法,垄断了中国整个油料市场。

文化市场。洋商快速地将世界上出现的新技术、新文化向上海传输、渗透。1896 年 8 月 11 日,仅距世界上最早在巴黎放映电影短片 7 个多月,洋商在上海徐园又一村放映“西洋影戏”。1908 年,西班牙商雷玛斯在虹口建中国第一座影剧院。雷玛斯号称“电影大王”,先后拥有 5 座影院。20 世纪 20 年代,是洋商投资电影院的大发展时期。至 1939 年上海有影剧院 50 多家,多数为洋商创办,使上海成为拥有最多和最好的电影院的城市。上海影片发行市场亦均为洋商垄断。洋商还致力于经营上海电影制片市场,也为上海电影制片走出第一步,使上海成为旧中国优秀电影艺术人才和电影制作技术最集中的城市。

这一时期,洋商在沪投资仍以英国为最多,计 7.37 亿美元,占 66.3%,占英国在华投资的 77%;其次为日本 2.15 亿美元,占 19.4%,占其在华投资的 24%;第三是美国,0.98 亿美元,占 9%,占其在华投资的 65%。长江流域是英美传统的势力范围,英美商人的投资偏重于上海。投资使洋商既赢得可观的利润,同时也改善了投资环境。上海庞大的金融体制,较好的基础设施,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使外来投资更为踊跃,进一步促进了上海发展。

洋商企业在上海的发展获得了极为丰厚的利润,诱导了上海民族资本积极引进先进技术,纷纷建立民族工业,并在外国资本挤压的艰难困境中崛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上海华商大大小小的面粉厂、棉纺厂、卷烟厂、火柴厂、铁工厂等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至 1933 年,上海工业总产值已达到 11 亿元多,超过全国工业总产值一半以上,纺织(包括服装)、轻工业,约占全国同行业产值 50%~70%,全国重工业中的机器、造船业主要集中在上海。上海拥有 30 名以上工人、使用机器的近代化工厂增至 3485 家,有资本 1.91 亿元,年产值 7.28 亿元,占全国 12 个大城市工厂总家数的 36%、资本额的 60%、产值的 66%。1935 年,上海 270 家经营较好的工厂有 146 家用的是国外先进机器,8 家用的是上海仿制进口机器,76 家兼有中外机器,只有 39 家设备比较陈旧。1936 年,上海工业总资本约 5.62 亿元,外国资本占 71%,民族资本占 29%。此时的上海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业中心。

上海工业的发展,又推动了上海进出口贸易的增长。上海自 19 世纪 50 年代初外贸总值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出口港埠后,一直雄踞全国外贸首港之位。对外贸易总值占全国比重保持在 40% 以上。1931 年,上海进出口贸易总值达 11.02 亿关两,为 1894 年 1.52 亿关两的 7.25

倍,是大连港的 3.45 倍,天津港的 5.6 倍,广州港的 10 倍,汉口港的 19 倍,占全国总值的 47.03%。在世界贸易总量中比重也日益上升。1931 年上海进出口总值已占当年世界贸易总值的 0.9%,1933 年上升至 1.1%,同年香港只占 0.5%,日本横滨也仅占 0.63%。

工业发展和对外贸易的稳步上升,促进了上海远洋航运和沿海长江航运,使上海成为中国万舸争流的航运中心和远东贸易大港的同时,又成为外贸商品复出口和埠际转口集散中心。1863~1894 年的 32 年中,月均进出上海港船舶 39.5 艘、28.98 万吨。1895~1936 年的 42 年中,月均进出上海港船舶 1731 艘、179.79 万吨。分别比前 32 年月均增长 3.38 倍和 5.2 倍。甲午战争前,上海港复出口和埠际转口贸易占进口总值比重的最高年份分别为 11.76% 和 70%。《天津条约》签订后,洋商享有内河及沿海航行特权,上海复出口及埠际转口量有所下降,但仍占有相当数量。1922~1931 年,主要大宗商品转口占进口值比重为:棉布 32.97%,棉花 6.20%,毛制品 35.56%,糖 41.69%,卷烟 50.50%,烟叶 23.59%,煤 17.67%,煤油 63.26%,汽油 28.78%,木材 8.65%,钢铁条 34.67%,纸 29.6%,硫酸铵 14.52%。1936 年江海关统计,这一年上海的埠际贸易值高达 8.91 亿元,占全国通商口岸埠际贸易总值的 75%,几乎等于当时埠际贸易量占全国 2~7 位的汉口、天津、广州、胶州、汕头、重庆的总和。上海执全国贸易、金融、工业、交通之牛耳。

上海城市近代化的发展,吸引了各方移民大量涌入。上海成为在华外侨、外企云集的中心。洋商企业 1901 年上海有 432 家,1921 年上升至 1741 家,占全国洋商企业总数的 18.31%,1936 年又跃升至 60.82%。洋商垄断集团、跨国公司有不少把该企业的中国总部、远东总部,甚至企业总部设在上海。上海的外侨人数也从 1890 年的 3821 人,上升到 1936 年的 6.2 万人。中国内地人口移民上海更加迅猛。至 1934 年,上海人口上升至 335 万人,仅次于伦敦、纽约、东京、柏林、芝加哥,在世界大城市行列中上升到第六位。

四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上海华界沦陷,大批商店、工厂毁于战火,百业萧条,唯租界未变成战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形成“孤岛”特殊形态。日军允许英、美、法等国船舶的海上航行及长江内河航行。租界依然与国外及内地有着联系,进出口贸易仍继续进行,由于战事的影响,初期一度衰落。日军在占领区掠夺重要物资,1938 年太湖流域产丝区就被日军劫去干茧 2.33 万担,并规定粮食、棉花不准出口,连皮革、麻、纱布、矿砂等也一概禁运出口。只有与军事关系不大的物资,通过所谓“规定”手续才允许采购出运。是年,上海进出口总值降至 1.28 亿美元,仅为 1936 年 2.73 亿美元的 47%,占全国比重也从 55.52%,降为不足 30%。但是当年第四季度起,侵华日军利用“孤岛”的特殊环境为其侵略战争服务,改变初期一味掠劫的做法,试图通过贸易攫取更多的战略物资,同时由于战事西移,租界相对稳定,周边省区难民大量涌入上海,多种游资流入上海,上海对外贸易逐渐恢复。次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市场商品价格暴涨,进出口贸易有利可图,进出口商大增,上海进出口总值由衰转盛,1940 年已恢复到战前水平,1941 年上升至 3.05 亿美元,为 1936 年的 112%。

此时,日商在上海的企业数急增。1940 年,日商在上海的日占区新设企业 65 家,恢复企业 34 家,依靠强权借口“委托经营”、“中日合办”、“租赁”、“收购”中国企业 203 家,加上原日商企业共达 800 多家。在公共租界及法租界内有洋商企业 271 家,其中日商占 110 家,英美商 122 家,其他国家商 39 家。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公共租界,上海全部沦陷,“孤岛”特殊形态告终。日军实行超经济战时统制,疯狂掠夺,竭泽而渔。其时,海运不通,商轮绝迹,上海国际贸易停顿,业务中断。未及撤退的英、美等国洋商被关进集中营,企业被接收。日军用“军事管理”、“委托经营”等方式掠夺英、美、加、荷、比等国在沪企业、码头、堆栈180家和华商纺织厂5家。华商进出口行远近洋贸易一律停止,正在海运途中的出口货被截劫或毁损。在日伪的全面统制下,上海的社会经济遭到空前严重破坏。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被日军掠夺之企业,各还原主;日商洋行都已关闭,德国洋商被遣回国;原在沪经营的英美洋商不少又重返上海。1946年4月,国民党政府颁布《新公司法》,刺激了各国洋商来沪投资。仅在3个月内,美国的公司、商号即在上海设分支店115家,美商资本迅速扩大。美国陈纳德与中国李名扬等在沪开办中美实业公司,资本10亿元。美商上海电力公司,装机容量占全市81.5%。是年春,美商进出口洋行231家,占上海洋行总数47%,同年冬又增至256家,比重升至48.9%。其他国家洋商投资也有恢复和增加,英商在沪新设企业27家。据上海市社会局1945.12~1949.3的登记,上海共有洋商企业2015家。1948年以后,由于政局动荡,洋商企业经营日趋困难,纷纷收缩和转移,美商大多转往日本,英商大多转往香港。上海口岸的国际贸易也和其他工商业一样日趋萧条,不久陷于全面停顿。1949年5月解放时,上海的洋商企业已由1948年的1307家萎缩至910家,其中进出口洋行376家。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上海市政府对外贸实行高度集中的贸易体制,统一管理上海对外贸易。同时,成立上海海关,实行新的进出口税制和外汇管理制,从根本上改变了外国人把持关税、洋商银行垄断外汇、洋行操纵对外贸易的局面。对洋商企业则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以及国籍、企业类型等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利用、征用、接管、代管、转让等方式进行整顿清理。1950年6月,经过清理注册登记,上海有洋商企业684家。按行业分,其中进出口业282家,金融、保险业45家,工业87家,商业157家,公用事业9家,房地产业44家,航运仓储业42家,其他18家。资产总值10642.31亿元(旧人民币),有地产11135.08亩,职工50472人。其中英、美、法商企业共349家,共有资产9726.52亿元(旧人民币),地产10906.53亩,职工47790人,分别占总量的51%、91.4%、98.4%、94.7%。据1956年统计,先后申请歇业481家,作价转让65家,改作华商18家,代管17家,征用16家,接管14家,其他30家。至1962年底,解放前遗留下来的洋商企业,还有4家外资、侨资银行和8家个体小户。

而根据现存资料,从1843~1949年在上海有35个国籍的2748家洋商企业(详见附录二,包括无国籍及国籍不明洋商企业73家)。洋商企业按行业分,其中以进出口业最多,为634家,其次为工业610家,第三为商业453家(详见下表)。

1843~1949年上海洋商企业统计表

单位:家

国别	合计	进出口业	金融业	运输业	机械工业	轻工业	纺织工业	卷烟业	房地产业	建筑建材业	化工、制药业	食品工业	公用事业	文化事业	商业	服务业	其他
合计	2748	634	137	157	97	147	133	61	77	80	92	132	43	209	453	218	78
英商	634	143	55	40	44	34	26	16	41	30	15	31	17	53	53	18	18
美商	369	149	25	30	15	30	10	12	8	4	16	8	7	24	17	11	3
日商	677	25	17	42	18	54	86	18	9	24	45	52	9	55	91	99	33

(续表)

国别	合计	进出口业	金融业	运输业	机械工业	轻工业	纺织工业	卷烟业	房地产业	建筑业	化工、制药业	食品工业	公用事业	文化事业	商业	服务业	其他
苏(俄)商	440	54	12	13	6	12	2	1	5	8	8	16	1	23	209	66	4
印度商	53	44	—	—	—	—	—	—	—	—	—	4	—	—	2	—	3
法商	121	40	11	4	2	2	5	4	8	3	—	3	5	18	12	4	—
德商	111	41	2	11	6	4	3	1	1	4	4	4	2	5	14	3	6
瑞士商	46	31	3	3	2	2	—	—	—	1	—	1	—	—	2	1	—
比利时商	14	6	3	—	—	—	—	1	2	—	—	—	—	1	—	—	1
意大利商	21	5	3	3	—	1	—	1	—	—	—	—	—	3	1	2	2
瑞典商	5	4	—	—	—	1	—	—	—	—	—	—	—	—	—	—	—
西班牙商	16	1	1	—	—	—	—	—	—	—	—	1	—	10	3	—	—
奥地利商	6	4	—	—	—	—	—	—	—	—	—	—	—	—	2	—	—
匈牙利商	6	2	—	—	—	—	—	—	1	—	—	—	—	—	3	—	—
葡萄牙商	14	5	1	1	—	2	—	—	—	—	—	—	—	3	2	—	—
挪威商	8	3	—	3	1	—	—	—	—	1	—	—	—	—	—	—	—
荷兰商	18	6	3	1	—	—	1	—	—	1	—	—	1	—	3	—	2
捷克商	13	8	—	—	—	—	—	—	—	1	—	1	—	1	1	1	—
希腊商	24	6	—	—	—	—	—	6	—	—	—	4	—	—	7	1	—
丹麦商	15	6	—	1	—	1	—	—	—	1	3	—	1	—	2	—	—
波兰商	16	10	—	—	1	1	—	—	—	1	1	—	—	—	1	1	—
朝鲜商	9	2	—	—	—	2	—	—	—	—	—	—	—	3	2	—	—
菲律宾商	6	3	—	2	—	—	—	—	—	—	—	—	—	—	1	—	—
叙利亚商	7	6	—	—	—	—	—	—	—	—	—	—	—	1	—	—	—
伊朗商	9	6	—	—	—	—	—	—	—	—	—	—	—	2	1	—	—
伊拉克商	2	1	—	—	—	—	—	—	—	—	—	—	—	1	—	—	—
土耳其商	3	1	—	—	—	—	—	1	—	—	—	—	—	1	—	—	—
加拿大商	3	2	—	—	—	—	—	—	—	—	—	—	—	—	1	—	—
巴拿马商	1	1	—	—	—	—	—	—	—	—	—	—	—	—	—	—	—
南斯拉夫商	1	—	—	—	—	—	—	—	—	—	—	—	—	—	1	—	—
锡兰商	1	—	—	—	—	—	—	—	—	—	—	—	—	—	1	—	—
巴基斯坦商	2	2	—	—	—	—	—	—	—	—	—	—	—	—	—	—	—
罗马尼亚商	2	—	—	—	—	—	—	—	—	—	—	—	—	—	2	—	—
埃及商	1	—	—	—	—	—	—	—	—	—	—	—	—	1	—	—	—
芬兰商	1	1	—	—	—	—	—	—	—	—	—	—	—	—	—	—	—
无国籍商	51	14	—	—	1	—	—	1	1	—	6	—	1	16	5	6	—
不明国籍洋商	22	2	1	3	2	—	—	—	1	—	—	1	—	11	—	1	—

说明:1. 根据现有资料中出现的洋商企业名录编制。

2. 运输业含陆、海、空运输及仓储业;机械工业含船舶工业及金属冶炼业,轻工业含印刷、手工、日用诸工业;公用事业含邮政、电信、电力业;文化事业含教育、文化、医疗、体育诸业;其他为行业不明的企业。

五

开埠以前，上海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帆樯如林，商贾云集，埠际贸易繁荣兴盛。此时，它已是中国的重要贸易港口之一，但在全国的地位并不突出。

英军炮火轰开中国市场大门以后，上海成为列强殖民的首选通商口岸，各国洋商接踵而来。他们任意圈地，建立国中之国——租界；倚仗特权，操纵商品输出，攫取中国经济资源，实现原始积累；继而资本输出，掠夺廉价劳力、物力资源，发展行业齐全的城市经济。上海很快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近代大城市。但是，上海的发展从一开始就烙上了深深的半殖民地的烙印。它是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下的产物，是以服从殖民者商品与资本输出为前提的。在这里，民族经济一直受到洋商资本的挤压，只能在夹缝中艰难求生，发展很不充分，更不能茁壮成长。城市经济中的重要行业，如外贸、金融、航运、房地产、工业、公用事业长期以来都是洋商占优势地位，有的行业直到上海解放前夕，都由洋商所垄断。洋商企业不仅得以长期在华攫取巨额利润，而且在使中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的国计民生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应该承认，这种损害与洋商在客观上所起的那些有利作用相比较，是难以弥补的。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上海洋商百年的发展史，是一部在列强炮火下被迫开放、殖民者恣意特权掠夺、上海人民饱含血泪的屈辱史。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列强通过殖民行动，把西方的工业文明强加在上海的时候，使他们未曾想到也和他们主观愿望相违反的是，西方的工业文明对上海的崛起确实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上海乃至中国在逆来顺受的被动接受中，逐渐对这种示范表示了趋同。因而上海成为西方文明的先导者，示范的窗口，促使上海这个城市发生惊人而超常的膨胀和发展，成为中国的外贸中心，中国的金融中心和远东的金融中心之一。

近代上海一百多年的洋商发展史，启示我们加深了对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认识。近代上海的对外开放是被动的、被迫的，而且还是不平等的。但即使这样的对外开放，也应该说比不开放要好，如果继续闭关锁海，不对外开放的话，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上海，上海也不可能成为中国变化最早最快的大城市。因而可以说，上海发展最大最根本的特征是对外开放。今天，我们开放、开放、再开放，现代国际文明不断为我们所吸收，上海发展的历史巨轮就会不断滚滚向前。

我们都知道一个普遍真理：“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尽管上海被迫开放后的崛起与发展，来自外力的冲刺，但是，中国人的事还要靠中国人来办。外人强加的西方文明，没有中国人的接受、认同和进而仿效，资本主义规范化的市场经济不能运行，近代化的大机器工业无法建立，上海的繁荣就不可能出现。现今，上海进入主动利用外资新时期，正是我们运用自我这个内因，在对内、对外开放的前提下，更加广泛充分地利用外因这个条件吸纳国际市场的先进技术、资金和产品，为我所用，同时向国内、国外市场提供土地、厂房、劳动力和加工品，使上海成为连结中国内地和世界市场的桥梁，从繁荣走向更加繁荣，不断现代化，不断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

晚清以来，百年的中国封建落后，闭不图强，国力日下。“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一条最深刻的教训。“以史为鉴”，让我们在近代上海洋商发展历史的镜子中发愤图强，丰盈国力，永远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回首近代上海洋商发展历史的根本出发点。

目 录

洋商史

(1)	总述——上海洋商发展历程	(1)
第一篇 解读洋商		
(1)	第一章 上海洋商的由来	(1)
第一节 洋商称谓种种	(1)	
第二节 条约制度下的洋商	(3)	
第三节 洋商的类型	(7)	
一、贸易贩运商	(7)	
二、散商	(8)	
三、中间商	(9)	
第二章 洋商与领事馆、租界、江海关之关系	(10)	
第一节 洋商与领事馆	(10)	
一、领事商人一体化	(10)	
二、领事馆是洋商的保护者	(11)	
第二节 洋商与租界	(13)	
一、租界为洋商而设立	(13)	
二、租界是洋商发展的安全岛	(15)	
第三节 洋商与江海关	(16)	
一、江海关成为“洋关”	(16)	
二、洋关制度维护洋商利益	(26)	
第三章 洋商与社会各界之关系	(28)	
第一节 洋商与买办	(28)	
一、买办制度的形成	(28)	
二、买办借助洋商谋利	(29)	
第二节 洋商与华商	(37)	
一、攀缘关系，共生共荣	(37)	
二、矛盾与抗争	(38)	
三、华商在洋商夹缝中壮大自己	(40)	
(2)	上海：1843~1956	
(3)	第三节 洋商与官绅	(43)
(4)	一、洋商与华官	(43)
(5)	二、洋商与洋官	(44)
(6)	三、洋商与乡绅	(45)
(7)	第四节 洋商与士人	(45)
(8)	一、洋商聘华士办报	(46)
(9)	二、洋商延聘华士任教	(46)
(10)	三、士人进入洋行	(47)
(11)	第五节 洋商社团	(48)
(12)	一、洋商社团产生发展的历史	
(13)	动因	(48)
(14)	二、商业类社团	(48)
(15)	三、救火会、消防队	(49)
(16)	四、各类娱乐总会	(49)
(17)	五、天足会	(50)
(18)	六、赈灾救济社团	(50)
(19)	七、万国商团	(51)
(20)	八、犹商社团	(51)
第二篇 上海进出口洋行的变迁		
第四章 特特权涌入上海的洋行	(54)	
第一节 早期洋行	(54)	
一、紧跟巴富尔进入上海的洋行	(54)	
二、黄浦滩形成洋行街区	(55)	
第二节 洋行的类型与经营方式	(56)	
一、洋行的类型	(56)	
二、洋行的经营方式	(57)	
三、洋行的经营手段	(57)	
第三节 洋行的非法活动	(59)	

安商年	
一、武装走私鸦片	(59)
二、一般商品走私	(62)
三、非法沿海贸易	(63)
四、“苦力贸易”	(64)
第五章 上海洋行发展历程：1843～1950	(65)
第一节 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	(65)
第二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时期	(72)
第三节 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时期	(74)
第四节 抗日战争到日本投降	(77)
第五节 抗日战争胜利后至上海解放	(78)
第六章 洋行操纵上海进出口贸易	(84)
第一节 洋行操纵上海进口贸易	(85)
第二节 洋行操纵上海出口贸易	(89)
第三篇 洋行在上海的经济活动	(94)
第七章 独领风骚的英商洋行	(94)
第一节 英商洋行始终拥有强大实力	(94)
第二节 英商洋行操纵上海进口贸易	(103)
第三节 英商洋行操纵上海出口贸易	(105)
第四节 英商洋行选介	(106)
第八章 美商洋行的崛起	(109)
第一节 美商洋行后来居上	(109)
第二节 美商洋行选介	(119)
第九章 日商洋行的发展	(122)
第一节 日商洋行与日本军国主义	(122)
第二节 日商洋行把持上海对日进	
出口贸易	(124)
一、对日进口贸易	(124)
二、对日出口贸易	(125)
第三节 日商洋行选介	(126)
第十章 德、法、俄、印度商洋行	(127)
第一节 德商洋行	(127)
第二节 法商洋行	(131)
第三节 俄(苏联)商洋行	(134)
第四节 印度商洋行	(136)
第十一章 其他国籍商洋行	(139)
第一节 瑞士商洋行	(139)
第二节 比利时商洋行	(141)
第三节 奥地利商洋行	(142)
第四节 丹麦商洋行	(142)
第五节 荷兰商洋行	(143)
第六节 瑞典商洋行	(144)
第七节 挪威商洋行	(144)
第八节 意大利商洋行	(145)
第九节 希腊商洋行	(145)
第十节 西班牙商洋行	(146)
第十一节 葡萄牙商洋行	(146)
第十二节 波兰商洋行	(147)
第十三节 捷克斯洛伐克商洋行	(148)
第十四节 匈牙利商洋行	(148)
第十五节 菲律宾商洋行	(148)
第十六节 朝鲜商洋行	(149)
第十七节 叙利亚商洋行	(149)
第十八节 伊朗商洋行	(149)
第十九节 犹太(以色列)商洋行	(150)
第二十节 加拿大商洋行	(151)
第二十一节 巴拿马商洋行	(151)
第二十二节 巴基斯坦商洋行	(151)
第二十三节 土耳其商洋行	(152)
第二十四节 芬兰商洋行	(152)